

侵华日军在中国倾销鸦片内幕

侵华期间,在板垣征四郎、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策划下,鸦片等毒品成了日军的秘密武器,“情报人员要想收买汉奸替日军效力,只要给他们鸦片就行了。”日本制作的纪录片《日军与鸦片》,详细披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倾销鸦片的内幕。

关东军特务与黑帮没区别

二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,前“中国派遣军”参谋长板垣征四郎、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被指控的罪名中有这样一条:“鼓励生产鸦片,助长毒品消费,致使鸦片在中国迅猛蔓延。”

现年90岁的前关东军特务处军官木村明说:“我们特务处的保险库内,除了大量现金,还放了大量鸦片。这些是间谍的活动经费。现金用完后,我们就把鸦片卖了换钱。10粒糖果大小的鸦片,其价格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。现在想想,卖鸦片换钱的特务机关和贩卖大麻的日本黑帮没什么区别。”

自伪满政权建立后,东北开始出现大量由“政府管理的鸦片馆”。当时伪满政权假惺惺宣称:为缓解吸毒者戒毒的痛苦,我们将在鸦片馆内“少量供应”鸦片。可实际上,任何人都能出入鸦片馆随意吸食,而鸦片馆获得的收入,则被关东军及伪满政权瓜分。据伪满政权于1937年制作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,当时东北地区吸食鸦片

等毒品的人达110万,在哈尔滨鸦片馆集中区域,每年有2000多个瘾君子横尸街头。

强制中国农民种植鸦片

贩卖鸦片的巨额收入,也成为关东军侵华的重要资金来源。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对鸦片业务指示:可令察哈尔(包括现河北、山西以及北京部分地区)9县中国农民栽培(鸦片)。

在河北省张北,当地一名老人回忆道:“当年这里的田种的都是罂粟。日本军人每天骑马挎刀,带着大狼狗到处巡视。最后日本人会把产出的鸦片都收走。”据关东军的内部资料显示,1934年,仅在内蒙古部分地区,从事罂粟栽种的人,就已多达100万。

除了强制中国农民种植鸦片,日本军队还曾从中国军阀手里抢夺鸦片。当时蒋介石实施禁烟政策,但中国各地军阀自产鸦片补充军费者甚众。一名现年91岁,曾在阎锡山手下任职的老人回忆:“日军第20师团曾在山西省吉县找到了数个秘密窑洞,随后抢走了窑洞内阎锡山所藏的33吨鸦片。这些鸦片最后被日本人卖了换钱。”

日本军人靠鸦片逃亡

随着侵华战争规模的扩大,日军对鸦片的依赖变本加厉。

原日军第39师团232连队的情报官鹿田正夫回忆称:“要想收买汉奸替我们搜集情报,就要用鸦

片,鸦片在当地如同货币。”

战后进行东京大审判时,日本商人里见甫的证词对揭露日军与鸦片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里见甫是巨型鸦片商社,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中宏济善堂的大老板。1938年之后,日本军方害怕若在华继续公开从事鸦片交易,将遭受更多国际指责。因此,命令日本商人里见甫开设名义上是“慈善机构”的宏济善堂,从事大规模鸦片买卖。

1943年底,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进行了抗议日本人贩卖鸦片的大游行,使宏济善堂遭受巨额亏损。许多从宏济善堂进货的鸦片馆被爱国人士放火烧毁,此事促使宏济善堂最终解散。

1945年8月9日,百万苏军猛攻盘踞东北的关东军,日军迅速溃败。混乱中,拼命逃亡的日本军人靠的又是鸦片。“钱已经没用了”,木村明说,“逃跑路上,我们只有用鸦片换东西吃。没鸦片,你寸步难行。”此时关东军总部内,鸦片堆积如山,参谋官们心急如焚,“苏军必将攻下东北,不及时把鸦片处理掉,关东军将因贩卖鸦片而被世人耻笑。于是,所有关东军参谋都连夜挖沟掩埋鸦片。”

战后,那些曾参与对华倾销鸦片的日本军人、政治家一言不发。日军与鸦片的关系,在世人的记忆里,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

摘自《上海译报》

反思“9·18事变”： 蒋介石的“三日亡国论”

“9·18事变”,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。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,又以东北为基地,向关内步步进逼,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中国半壁河山沦陷,伤亡3500多万人,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。因此,83年后的今天,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“9·18事变”的教训。

事变经过

日本军阀为发动“9·18事变”做了周密的准备。事先组织了多次“参谋旅行”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。1931年4月,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,以便支援关东军。

1931年9月18日夜,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,一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。一周之内,日军占领了吉林、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、12条铁路线。11月19日,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。1932年2月5日,日军占领哈尔滨。

由于蒋介石下达的“不抵抗”命令,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,驻扎在辽宁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,并很快撤离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。这样,“9·18事变”爆发4个月之后,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沦陷。

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

“9·18事变”发生后,蒋介石

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,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,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,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。

蒋介石多次喊出“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,而是共产党”,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。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《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》的演讲时,抛出了著名的“3日亡国论”:“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,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、辽之范围,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,则……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,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。”

日本能否三日内灭掉中国

“9·18事变”爆发时,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.04万人,退伍军人1万人,警察3000人。共2.34万人。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,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,可以迅速回师关外。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。

1931年,日本是否有能力三天灭亡中国呢?实际上,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。当时从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相比,中国都占优势。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,不但不会三日亡国,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。摘自《环球》

刘伯承之女延安被害之谜

1940年春,延安中央托儿所(后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)成立。大批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抗日将领将孩子送到延安来,以免除后顾之忧。战争环境艰苦而漫长,但洛杉矶托儿所成百上千个孩子都活了下来,唯独刘伯承元帅的二女儿华北死了,当时,她只有6岁。

日本投降后,大量国民党特务潜入解放区。洛杉矶托儿所里有不少中央首长和前方指挥作战首长的孩子,所以这里也就成了特务们注意的目标。

1945年8月18日是星期六。晚上,所长丑子冈照例提着马灯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查房。临走时,丑子冈又对两个值夜班的保育员叮嘱了半天。两个女保育员四处巡查了一圈,没有什么动静,便站在院子里说话。老保育员说:“我去烧点开水就来。”她走后没多久,年轻的保育员肚子有点疼,吃了几片药,便和老保育员一起回到院子里。两人又沿着托儿所的院子巡查。

第二天早晨,值班的阿姨吹响起床哨子后发现华北没有起床。她是一个遵守纪律的孩子,不是病了?照看华北的阿姨忍不住叫道:“华北,该起床了。”没有任何动静。阿姨慌了,忙走到华北的床头。然而,被子蒙着头的华北依然一动不动。阿姨一把掀开被子,眼前的景象使她惊呆了:华北浑身是血地躺在那里,身体早已僵硬,小腹部被人用刀子划去了一块。

接到女儿被害的消息,刘伯承

夫妇愣在那里。“这消息准确吗?”

“准确。丑所长请您与汪荣华同志去托儿所面谈。”通信员报告道。通信员走后,刘伯承坐在椅子上,一直没有抬头,他怕看见妻子那双眼睛。

刘伯承、汪荣华赶到托儿所时,看到华北安静地躺在床上,身上穿了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花衣服。在所长办公室中,刘伯承强忍住悲痛,劝慰正在哭泣的保育员们:“请大家不要太难过了。敌人以为暗杀我女儿,我就会心神不定地对他们手软吗?这是痴心妄想。”

华北被安葬后,洛杉矶托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受到了审查。与华北同在一个窑洞住的保育员说:“夜间有一个叔叔,头上包了布,拿着手电在华北床前,华北说,叔叔我认识你,那个叔叔说,你不要吵闹,我给你饼干吃。后来就不知道了。”

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,组织上展开了周密的调查。然而,这件事一直是个悬案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知情者说》披露,国民党特务杀害华北是有目的的。刘伯承是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,国民党对他恨之人骨,曾多次想谋害他,因无法接近,便把目标转向了他的孩子,但刘伯承没有因女儿被害而停止征战的步伐。

刘伯承元帅临终前,躺在病床上,提起女儿被害之事时,仍然十分难过:“二女儿的案子没能破,我是死不瞑目啊。”

摘自《大连晚报》

华国锋四子女的生存现状

既无出国的,也无经商的

1976年“天安门事件”后,根据毛泽东的提议,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,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。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,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。

毛泽东认为,华国锋具有在县委、地委、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,经受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考验,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,各方面都能够接受。因此,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。华国锋接班后,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,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,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,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,毅然决然地结束了“十年内乱”,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。

但是,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
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、彻底否定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、彻底否定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政治远见,也缺乏解放思想、革故鼎新、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。因此,华国锋成为结束“十年内乱”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“一个过渡人物”。

华国锋原名苏铸,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,取意于“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”。因此,他的子女都不姓华,而姓苏。四个子女,既无出国的,也无经商的,都是本分的普通人。

华国锋的长子苏华,原在空军某部任职,现已退休,至今仍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,同事对他的评价是:“很朴素,没有架子,与同事关系很好。”

小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,也已退休。苏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,近十年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、股权投资和企业收购兼并。2005年至2009年任中国煤炭暨焦炭投资基金联席主席;2007年起任香港能源矿产联合会的名誉主席。2011年,担任金山能源非执行董事。

四个子女中稍为显赫的或许是大女儿苏玲,现任中国民航总局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、工会主席的她,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对此,苏玲快人快语用“出乎意料”来形容自己当选后的第一反应。

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,在华国锋生前担任他的生活秘书。

摘自《读友报》

莎士比亚原是奸商?

英国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,文学巨匠威廉·莎士比亚还有另外一面,“竭尽所能避税、趁饥荒囤粮并高价倒卖,剥削弱势群体”,1613年退休时成为家乡最大的财主。与此同时,他“写出表现他们困境的戏剧供他们娱乐”。

学者们在研究报告中写道:“莎士比亚囤积谷物的经历遭到历史篡改,才有了‘创作天才’莎翁的形象”。

报告写道,莎士比亚在15年间“购买和储存大麦等谷物,然后以溢价倒卖给邻居和当地商人”。另外,莎士比亚对那些不能付全款的买家追债,利用所得利润继续“借钱活动”。莎士比亚曾因逃税遭当局追查,1598年因在粮食短缺期间囤积谷物遭起诉。

英国学者杰恩·阿彻说,对于历史上许多作家而言,饥饿既是心头大患,也能激发他们创作许多作

品。阿彻认为,莎士比亚是名冷酷商人的想法,可能与他浪漫敏感的形象不符,但读者对他不必苛责。毕竟,囤粮可以确保他的家人和邻居不会在灾年挨饿。她说,莎士比亚1616年去世后,家乡教堂为他竖起葬礼纪念碑,上面的莎士比亚手持一袋谷物。到18世纪,他的这一形象被手持软垫和羽毛笔的莎士比亚取代。

摘自《北京晨报》